

丁景唐先生采访稿

丁景唐，祖籍浙江镇海（今宁波市北仑区），1920年4月出生于吉林。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9月转学沪江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的治学之路。解放前，他曾任《小说月报》、《文坛月报》编辑，领导过多种学生刊物。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二十卷本）等。



丁景唐

2010年11月2日下午，我们如约前往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并采访丁老先生。第一次前往华东医院采访老学者的忐忑心情，于丁老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走入会议室时，烟消云散。我们难以相信眼前这个看似最多古稀的老人分明已是耄耋之年。精神矍铄，神采熠熠，鹤发童颜，和蔼可亲。而当采访开始，当丁老不紧不慢地，如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般为我们娓娓道来那年、那人、那事；那段过往，那些阅历，那摞成就时，我们才真正领略到丁老的风采，感慨先辈青年时的奋进，与如今暮年时的淡然。

丁老记忆力非常之好，并且对时事也是谙熟于心。因此，对于我们抛向他的各式各样问题，无论是关于他的生平，抑或是同他交流对于当下时事的看法，他不仅思路清晰、有问必答，观点也颇为大胆且具有启发性。此外，他对于工作的认真负责更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对于某篇文章中出现的一点小小的错误他也甚为认真地指出并更正，又一再嘱咐我们要代为转达。这样严谨的工作态度对于这样一位享有极高声望的耄耋老人实在是难能可贵！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已让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认真态度、学识丰富深深折服，愈发想追随先辈的脚步，去寻回那抹最本真的红色。无奈时间已慢慢逼近医院的晚餐时间，我们不忍心耽误丁老用餐，只好带着遗憾匆匆结束了采访。但相

约，再见。

颠沛流离童年时光

时间倒退到那个动荡年代。内外交迫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的种种变故导致丁老的整个童年的艰辛、心酸。他出生于吉林，3岁时因父亲失业而随父母南归镇海。但仅仅过了三年，七岁的他便连遭父亲和祖父去世的打击，十一岁时，乡下发大水，他跟随姑姑到上海生活。就在此时，“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只得逃难回宁波江东，以避战火。然而，祸不单行，年仅三十余岁的母亲不堪贫病交迫，抛下他和幼小的妹妹离开了人世。幸好他有亲如母亲的姑姑和叔父抚养他成长，使他走上新的生活路程。慰藉他年幼心灵的正是此后成为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文学。

十五岁起，他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阅读文学刊物，跑图书馆，逛书店和旧书摊。书籍大大丰富了他的课余生活，也使他萌生了动手创作的念头。同时，就是在广泛的阅读中，他接触到大量创造社和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这些进步文学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难忘沪江师生故友

顺理成章的，1942年9月，当时二十二岁的丁老转学沪江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开始了他的治学之路。他师从王治心、朱维之、黄云眉学习中国文学，在校期间，他撰写了不少关于《诗经》、秋瑾、陆游、朱淑真等的论文和《论巴金作品的文法研究》，还常去设在大学附近的原工部局图书馆看书。

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他仍坚持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负责学委系统的宣传调研工作。根据党的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自己不能办刊物，就组织原《海沫》、《中学生活》、《联声》的编辑干部等向敌伪办的刊物或商办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既不暴露又有内容的作品。

笔者在准备资料时，找到了丁老于八十周年校庆时所写的一篇回忆录，其中有一段讲述的是丁老在沪江大学时同班的同学们。笔者惊讶于丁老惊人的记忆力，因为，文中对每个同学的姓名都不无巨细。所以，除了沪江的同窗们，我们不知丁老对在沪江的学生弟子是否仍有印象，于是今天我们也特意同丁老聊了一

下他的沪江师生情。

丁老说首先他要感谢沪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朱维之先生，1948年夏把流亡香港的他召回沪江大学任助教，在朱维之师的精心掩护下，秘密隐居沪江大学，躲避了反动派鹰犬的黑爪，安然度过险恶的境遇。一聊到同学们，丁老就显得特别的兴奋。他告诉我们，解放后，最早见到的学生是沈忆琴，她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的秘书。丁老还与三位学生有着联系，一位叫黄万啭，是位印尼华侨，当年，丁老在中央党校参加各省市宣传部厅局级学习班，而《辞海》编纂小组也正好邀请黄万啭参与编写关于社会主义的词目。当时还是一名青年教师的黄万啭于党校重逢恩师，尤为感慨。另一位叫陈其妍，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丁老在五七干校落难时就与陈同学保持了联系。还有一位同学名叫孙念怙，目前是我国妇产科方面的权威专家。对于能与孙教授联系上，丁老特别感慨，也特别高兴。丁老告诉我们，他多年以来一直非常想念一位当时沪江生物系的高材生，因为她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当时在沪江，是没有老师敢用九十分以上的高分评定作文成绩的，但是，当年还是一名普通助教的丁老却打破纪录地用了九十一分肯定了这位同学的作文。获得这个高分的同学就是孙念怙。丁老告诉我们，一直以来，他四处打听，用了六十二年的时间，终于在去年，经过上海沪江大学同学会总干事郑维淑之助，找到了他的这位得意门生。时光荏苒，当年生物系的才女如今也已八十高龄，白发苍苍。但是，她果然如丁老所寄望的那样，现今是国内当之无愧的妇产科权威。并且，丁老还特别提到，孙教授虽年事已高，却依然坚持每周一次在北京协和医院坐诊门诊，之前还经常志愿支援贫困地区等等。丁老对于他如此想念的一位得意门生有如此高尚的医德倍感欣慰与感动。他说，一个教师生命当中有那么几个学生在困难环境中遇到，或带有传奇性地相逢，总让人感慨，体味为师的意义。此刻，笔者也被丁老与他的学生们浓浓的师生情深深感动着。

曲折经历不变信念

丁老一生从事的都是出版、文化工作，因此对于文革那段特殊时期中，工作如何开展，笔者抱有疑问。思量再三，笔者还是小心翼翼地提问了丁老，不想，丁老很直爽，完全打消了我们的顾忌。

特别是对于文革十年，丁老说，那段时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斗争哲学，天天斗，夜夜斗，时时斗，文革的严重错误实在太沉痛。那几年，到处都是上纲上线的大字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已经担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的职务，但一九六六年，我便被划入“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和“走资派”的行列，被指斥为“为文艺黑线树碑立传”。原定的整理、影印革命文艺史料计划被迫取消，已印成的，有些也被毁之一炬。我被轮番批斗、抄家，备受凌辱，要定期前往群众监督小组汇报情况，其余时间还要负责打扫里弄。当时，我的长女在山东上大学，甚至于她暑假期间回家，行李也全都要接受检查。丁老总结斗争年代的人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械化错误理解，只承认了事物矛盾的对立性，却否定存在着矛盾的统一性。

丁老的坦率让笔者顾虑全无，问道，那您文革后在创作时有没有一点后遗症呢？丁老立即回答曰：那哪是一点啊，后遗症相当严重！丁老如北方人的豪爽坦诚引得会议室众人皆哈哈大笑。他说经历了文革，人们不能再昏头昏脑的了，不一定说会脱胎换骨，但起码知道了要深刻反思，这样看问题才能比较公平公正一点。当然，说后遗症相当严重有些嬉笑了。而今天，面对面，丁老调侃般地讲述自己文革时所受的磨难。他说那是因为他把我们这些八零后当做革命后代看待了。闯荡社会后，人的思想会复杂很多。他想要告诉青年人，头脑是自己的，自己一定要有思辨能力。虽然做到这些可能很难，但年轻人一定要去学，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学好。

深谙时事独到见解

丁老饱经世故、练达世事之后，夙兴夜寐心态平的气度让我们深深震撼。更让我们感到钦佩的是，今年已九十有余的丁老对于时事政策的关注和见解。对于现在越来越高的房价，丁老也表示非常无奈；对于消费指数CPI的涨幅远超银行利率的提高，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等等现象，丁老也非常担心。他说，仅仅追求国家GDP的增长不是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才是真正的谋实事。

谈回老本行，笔者与丁老聊到方舟子被打案，社会出现的怪异现象：某些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比战地记者还危险；聊到对香港游客菲律宾劫持案，凤凰

卫视选择做出全程实况报道……，关于这些，丁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有什么看法。他毫不避讳地说，如果他现在依旧在位的话，他也会这样报道的。他说我们应该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相信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在伟大的党的坚强领导下，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不同的人也必定不会相同，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成绩与缺点都要正确对待，这也再次印证了我们学习哲学辩证法的重要性了。

采访的最后，笔者请丁老向当代大学生推荐一些读物，丁老却有些担心他的想法会否已经跟不上年轻人的脚步。因此他只是简单地为我们罗列了一些：巴金的《随想录》、李瑞环的《学哲学 用哲学》、《联合时报》、《环球周刊》、《作家文摘》、《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报》副刊等等。丁老鼓励年轻人少看那些空洞的八股文章，要多看有见解的文章来开拓思路。他还意犹未尽地与我们分享了他最新的思想研究成果：探索与争鸣，融合与认同，突破与创新。

如最初见到丁老，我们被他的答话考倒时，丁老像个孩子般狡黠的哈哈大笑。丁老的笑容延续了整个采访过程，而我们坚信，这份笑容亦会如他铿锵的文字，一直延续下去。一直。

丁老先生，祝您安康。

■采访、撰稿：光电学院 俞诚、蒋研梦

丁景唐2011年6月18日校正于华东医院